

昆明历史文化寻踪

编委会

主 编：龙东林

成 员：李自明 袁国友 赵 勇 沈 德 字应军

汪献勇 马颂梅 张宇川 张海燕 王清海

张学琼 黄忠勇 杨富刚 赵晓春 于 春

前 言

昆明是中国政府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资源。作为中国西南边疆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创建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秀丽的山水风光，更有着质朴宽容，开放和谐，多元一体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为继承和发扬昆明的历史文化传统，弘扬和光大昆明的人文历史精神，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很多资料详实、论据准确、推理缜密、见解独到的研究成果，成为昆明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随着“三个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标准的重新确定，昆明的历史文化研究突破了僵化教条的思想桎梏，在众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历史问题、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均有不同于往昔的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城市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地方民族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发展过程等领域，取得了大量令人自豪的优秀成果。许多前人没有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领域都有学者在潜心研究。昆明历史文化传统的全貌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全方位地展现出来。昆明城市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规律也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中日渐丰富、明晰起来。在昆明城市发展过程中那些在历史重大环节、重大转折点上反复出现的基本矛盾也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昆明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特质及其基本问题也渐次地出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昆明的城市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发展变迁的规律性研究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昆明城市史的研究空前活跃、成果空前丰富。在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紧迫。欣喜的是研究成果数量多、质量高，紧迫的是如何才能将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及时地介绍给昆明的城市决策者、管理者、规划者、建设者，介绍给社会各界关注、关爱这座城市的热心人，使之为昆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昆明社会科学》及其前身《昆明社科》是昆明市社科联、昆明市社科院主办的综合性社科学术刊物。自1989年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昆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承蒙众多史学界专家学者的眷顾，提供了大量昆明地方史和地方文化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陆续刊登在18年的1-110期《昆明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栏目中。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加关注昆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加迫切地想要加快昆明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总结昆明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认真提高我们对昆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科学地指导今天的发展，实践科学发展。为此，我们将18年来《昆明社会科学》所刊发的有关昆明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整理集结，形成这套《昆明历史文化寻踪》公开出版。

本书收编的成果限于昆明城市史和与之有关的领域，很多曾在《昆明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其他历史研究成果均未收入。入选文章中既有从宏观上研究介绍昆明历史宏大进程的总论性研究，也有从不同角度对具体事件、具体问题、具体人物进行细微剖析、深入研究的专题、专论性研究。很多文章既有内容上的联系又有体系上的连续，通过编辑整理，这些原来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成果，现在形成了系统的相互关联、印证的研究成果，是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不可多得的基础性学术成果，相信出版后将为后来者提供很好的学习、研究和参考资料。本书作者有云南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宿儒，如谢本书、朱惠荣、胡绍锦、易学钟等前辈学者，也有袁国友、马颖生、字应军、廖国强、何明等云南史学界专事昆明城市史研究的中生代学者，还有史学大军中擅长用新视角、新方法演绎新成果的新生代学人。

本书集18年之研究成果，成书过程可谓漫长，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书中部份文章所持的论据、观点可能在作者后来的研究中已有修订，但本书本着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均以文章发表时的面目示人，未作修改。书中作者的工作单位变化很大，现所署单位多数是作者原文发表时的单位，个别作者有要求的则按现工作单位刊出。本书编辑过程中，袁国友、字应军对全书书稿做了大量审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龙东林 谨识

2008年6月

目 录

昆明历史发展总论

历史文化育名城

- 昆明发展历程的回眸与扫描 龙东林 袁国友(1)
- 昆明城市建设与发展演变初探 余文斌 张 骞 马颖梅(28)
- 昆明纪念建城 1240 周年评选历史上三个“十大”的情况综述 (41)

古代昆明城市的演进与发展

- “昆明”一词的由来和昆明城的建立 宁 超(50)
- 古代昆明城市的出现与演变 马颖生(54)
- 昆明建城史及城名演变
- 纪念昆明建城 1240 年 宇应军(66)
- 古代滇池地区的两度辉煌
- 在“昆明纪念建城 1240 年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海涛(90)
- 论云南最早的文庙始建于元代赛典赤治滇时期 李清升(96)
- 清代昆明地区商业发展变迁概观 袁丽华 袁国友(106)
- 试论地理因素对昆明城历史发展的影响 陈庆江(117)
- 古代诗人眼中的滇池 温梁华(121)

近代昆明历史风云

- 杜文秀起义军东征昆明之战 马颖生 曾光地(132)
- 辛亥昆明重九起义概说 谢本书(139)
- 李根源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 谢本书(149)
- 中韩关系史的重要见证
- 《李范奭自述》中译本前言 龙东林(158)
- 昆明设市由来 万按一(167)
- 西南联大:近代教育史上的创举和奇迹 袁国友(171)
- 龙泉镇的抗战时期文化遗存及人文价值 卜保怡(179)
- “著书昆明立说联大”的新儒家 李德仁(189)

费孝通与呈贡古城村	陈 华(200)
试论抗日战争对昆明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何斯民(203)
抗战时期云南大学惨遭日机轰炸纪实	谭茂森(213)
抗日战争中云南的机场建设及其历史作用	闵红云(216)
昆明在抗战时期对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张 霁(222)
档案所见 1938 年昆明的金融与币制	梁屹峰(228)
昆明:中国的西南门户	[美]约瑟夫·E·帕桑提诺(231)

昆明近代城市化历程透视

近代昆明城市的萌芽	曾秋月(242)
1912 - 1937 年昆明近代工业与城市化	廖国强(250)
1912 年至抗战前昆明近代金融业与城市化	廖国强(264)
1937 - 1945 年昆明近代城市化的跃迁	袁国友(271)
1945 - 1949 年昆明近代城市化的衰缓	宇应军(286)
昆明城市化与工业化历程述略	何 明(298)

昆明历史街区寻踪

昆明市顺城街回族社区的文化变迁	马寿荣(310)
文明新街述怀	马荣柱(328)
昆明旧城城门、城楼及牌坊考	万天一(332)
昆明老街道:高山铺、安宁巷	姜定志(338)
五华山名考	朱惠荣(344)
昆明地名命名规律	张映庵(347)

昆明考古文化探索

新中国建国五十年来昆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胡绍锦(354)
石寨山滇墓	胡绍锦(364)
羊甫头滇墓	胡绍锦(370)
滇王庙的结构功能和礼仪功能	易学钟(375)
拓东城址考	胡绍锦(383)
昆明城区南诏古文化遗址之发掘及其意义	胡绍锦(392)
赛典赤·赡思丁墓地考	李清升(396)
昆明地区的明代墓葬	胡绍锦(403)
昆明地区的清代墓葬	胡绍锦(413)
昆明原始岩画概述	胡绍锦(421)

古城文化与民俗

- 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的历史文化探源六题 龙东林(425)
- 著名国画家萧士英先生 马颖生(436)
- 昆明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蜚声中外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
——纪念田汝康教授逝世一周年 马颖生(440)
- 昆明的书院 刘宝镜(447)
- 昆明谚语与昆明汉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 张映庚(455)
- 昆明方言的溯源 张映庚(461)
- 昆明地名的审美特征 张映庚(468)
- 昆明的商业招牌 张映庚(476)
- 昆明“吞口瓢画”造型艺术探微 罗新元(482)
- 昆明古代瓦当艺术 胡绍焯(486)

宗教文化

- 天主教的传播及其对滇中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袁国友 张学琼(491)
- 云南回族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分布 马颂梅(500)
- 云南回族清真寺寺院经济简论 马颂梅(505)
- 昆明佛塔述略 生永莲(511)

古城历史文化保护

-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 昆明市政协、市社科院、市文化局课题组(516)
- 现代化与历史名城保护的冲突与融合
——国内外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利用 龙东林(537)
-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再认识 卜保怡(545)
- 论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若干问题 马颂梅(551)
- 全球化与本土文化资源的保护——以昆明为例 龙东林 马颂梅(559)
- 晋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567)
- 郑和下西洋与15世纪上半叶中国——东南亚的关系
..... 龙东林 沈 德 张学琼(执笔)(591)

昆明历史发展总论

历史文化育名城

——昆明发展历程的回眸与扫描

龙东林 袁国友

一、世界最早的古生物的故乡

说到历史，人们首先要问：“人是从哪里来的？”、“人类起源于何处？”然而，既然人要依靠从自然界的动植物资源中获取食物才能得到生存，那么，动植物的起源肯定比人类的起源更要早。动植物尤其是动物究竟源于何时呢？

科学家们认为，在距今 5.6 亿年至 5.3 亿年之间，出现了地球 38 亿年生命演化历史上规模最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生物创新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它在不到地球生命发展史百分之一的“瞬间”创生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动物门类。尽管“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否是一次真实存在过的生命大爆发事件，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论争，就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对这一问题也感到困惑不解。在 20 世纪暮色中的 1999 年，中国科学家的发现和研究对于揭开这个万古之谜提供了最重要的证据，这就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化石的发现和研究的。

“昆明鱼”和“海口鱼”化石是在云南省昆明市的海口地区的早寒武纪地层中发现的。发现者为中国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所的舒德干教授等科学家。

昆明鱼和海口鱼的形态相似，皆呈鱼形，长约 3 厘米。海口鱼为正常死亡后埋藏，身体后端略有腐烂耗损，而昆明鱼为活埋标本，保存极为完美，除了前腹部清晰的鳃囊构造和组成躯干的“之”字形肌节之外，还完好地保存了原始偶鳍和围心腔。海口鱼的器官构造与昆明鱼十分相似，但咽腔中已出现了软骨型鳃篮，而且背鳍中也产生了鳍条，表明它比昆明鱼更为高等。

据科学家们考证，“昆明鱼”和“海口鱼”距今约 5.3 亿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脊椎动物。过去已知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产生于 4.8 亿年前的奥陶纪，昆明鱼和海口鱼的发现，将包括人类在内的脊椎动物的起源至少提前了 5000 万年。

科学家们认为，“昆明鱼”和“海口鱼”化石的发现，不仅是揭示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全貌，而且为生物学中关于脊椎动物及其重要器官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专家们认为，这是迄今已知最进步、最高等的动物化石，它代表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关于寒武纪大爆发研究中最重要、最关键性突破，是本世纪国际古生物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昆明鱼”和“海口鱼”化石的发现，表明在很远很远的地质时代，现今的滇池地区就已是各种生物起源和生长的重要地区，昆明也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古生物的家园和故乡”。

昆明不仅是古生物起源的地方，而且也是古人类栖息的家园。现代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在很早的历史时期，滇池周围地区就有古人类的活动。在呈贡县大渔乡的龙潭山古人类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昆明地区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颅骨、顶骨、体骨和牙齿化石，经科学测定，这些人类遗骨的年代为距今 30500 年左右，专家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把这些古人类命名为“昆明人”。到了新石器时代，滇池地区已有定居的农业民族生活在这里，他们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从事渔猎、采集、饲养等活动。

所有这些说明，滇池流域这块水草丰美、林木茂密的地方，确实是上天赐给人们的一块充满生机的美好乐土。

二、古滇国的辉煌

昆明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昆明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而昆明两千年历史和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就是古代的滇文化。

约在公元前后时期，即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滇池地区的众多部落联盟，联合起来建立了强大的“滇”王国。滇王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滇王是“滇国”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关于古代滇王国的情况在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千古名著《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已有记载，但是两千多年来，对滇文化的具体情况人们却知之甚少。1953 年，云南省博物馆从一位古董商人的手中收购到 10 多种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器形制不同于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器。这些器物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关注和兴趣。经过多方调查，查明了这些器物出土于晋宁县的石寨山。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一线索，对石寨山古墓群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从此一个掩埋于地下两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展现在人们眼前。

从 1955 年至 1960 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进行了四次清理和发掘，发掘古墓 50 座，共获得各类随葬品 4000 多件。石寨山所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作战兵器，宗教用具等各个方面。生产工具有：斧、长方形锄、尖头锄、耜、刀削、镰刀、锯等。作战兵器有：剑、戈、矛、斧、铍、狼牙棒等。生活用具有：釜、壶、尊、杯、勺、针线筒、绕线板、贮贝器等。宗教用具主要有铜鼓等。这些青铜器制作均极精美，内容极其丰富。如石寨山 2 号墓葬出土的一个雕铸有杀人祭祀场面的贮贝器，高 57 厘米，面径 29 厘米。贮贝器器盖上铸有立体建筑和人物群雕，其所铸人物竟多达 127 个，分别作宴饮、奉物、屠宰、炊爨、吹奏、舞蹈、行刑等动作和情形，形象地再现了祭祀活动在滇王国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石寨山滇王国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枚刻着“滇王之印”四个篆字的金印。金印重 90 克，印面边长 2.4 厘米见方，通高 2 厘米，印钮为蛇形，蛇首昂，蛇身盘曲，背有鳞纹。这枚金印的出土，不仅证明了史书中所记的古滇国的存在，而且说明晋宁石寨山地区就是古滇国的统治中心，石寨山古墓群就是滇王国的王族墓地，有一代或几代滇王安葬于此。

如果说石寨山青铜文化反映的是西汉中期滇王国达到鼎盛时的文化景象，而羊甫头青铜文化所反映的是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滇文化后期的景象。羊甫头文化的遗址在官渡区小板桥镇羊甫头村，1998 年 9 月至 1999 年 6 月，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在此对古滇国墓

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2万多平方米，滇文化墓葬524座，共出土文物5243件。专家们认为，羊甫头青铜文化考古发掘是云南省继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考古发掘后又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且在规模上超过了以往各次。

羊甫头发掘出的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东汉时代大中型墓有长方形墓道。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西汉墓地随葬品出土的器物有青铜农具、工具、兵器、乐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东汉墓出土的青铜器有青铜釜、甗、提梁壶、耳环、摇钱树、动物模型等，还有一些金银器、陶器等。其中出土器物最为精美和丰富的是编号为M113的一个大型木椁墓，从这个墓的椁底腰坑内共出土了近千件精美器物，有保存完好的漆木器，有成捆带漆木柄的兵器、工具、农具，有成套的铜鼎、铜釜，有艺术价值极高的木雕漆工艺器、各种竹编用具，以及木质和铜质的乐器、纺织工具等。

考古工作者认为，滇池流域所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制作工艺之高超、花纹图案之精美、内容之丰富、特色之鲜明都令人叹为观止，比之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也毫不逊色。这反映出了古滇国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根据考古发现和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古滇国的基本社会生活状况。滇人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贵族妇女担任祭祀活动的主持者。除了农业活动外，滇人还从事畜牧、捕鱼、狩猎等各种活动，以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服饰上，滇人无论男女，均穿无领对襟外衣，长仅到膝部，光着脚。男女均把头发叠成髻，中间以带束之，男子的髻在头顶，妇女的髻拖于脑后，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椎髻”。当时滇国与其他部落之间，为了掠夺对方的财富和奴隶，经常发生战争和冲突，在战争前和战争后，滇人往往要举行各种仪式。

在论说古代滇文化时，我们还须提到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庄蹻王滇”和汉武帝开西南夷。

“庄蹻王滇”的事件大约发生在战国晚期，也即大约是滇文化的早期。这一事件的起因和过程是这样的：在战国晚期，中原内地经过长期的战争，一些弱小的诸侯国被各大国攻灭，只剩下七个强大的诸侯国，这就是史称的“战国七雄”。地处南方的“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出于与秦国争夺霸权的目的，派大将庄蹻率军进入滇池地区，征服了当地部族，将其纳入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后，庄蹻率军北返，可这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国派军占领了楚国的巴、黔中郡，楚军北返的道路被切断。庄蹻及其率领的楚军，只有再返回滇池地区，并长期驻扎下来，改从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由于楚军兵强马壮，庄蹻也就成为当地人的首领，这就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庄蹻王滇”。所以人们也认为，滇王中可能有庄蹻及其子孙。庄蹻王滇也是有史记载的内地人民进入云南地区的开始。

如前所说，在石寨山曾出土了一枚“滇王之印”的金印。这枚金印的所有者为滇王，而这枚金印的颁赐者却是西汉武帝。这枚金印的出土，反映出了滇王国时期云南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西汉武帝开“西南夷”，在滇池地区设置“益州郡”。当时，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决定对包括滇国在内的“西南夷”地区进行强有力的管辖和治理。汉武帝先派使者对滇王进行劝降工作，滇王自恃地方广大，兵强马壮，与其他部落间结有军事同盟，不肯投降，反问“汉孰与我

大？”劝降未果，汉朝大军发起征伐，滇王寡不敌众，被迫出降。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在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地区，设立了益州郡。益州郡治所设在滇池县，滇池县在今天的晋宁、呈贡一带，其中心的地区在晋宁县的晋城镇。由于益州郡的设置，使云南地区正式纳入汉朝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自此之后，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地区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考虑到滇国的具体情况，汉武帝在设置益州郡的同时，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颁给滇王王印，让他继续统治滇国的各部族人民，实行与内地有所区别的特殊统治方式。在益州郡设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滇池地区在学习和吸收中原地区文化基础上，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继续朝前发展。这在羊甫头文化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汉代时，现今的昆明市是谷昌县所在的地方。谷昌县是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一，其地根据有关记载来推断应在今昆明金马山西麓，黑土凹背后山坡上。从时间上来看，谷昌城应是现今昆明市最早建立的城池，只是谷昌城遗址今已荡然无存，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汉时的谷昌城从规模上来说应该仅是一个很小的土城而已，有城之名，但城之实恐怕还不具备。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昆明”这一名称的来历。“昆明”这一名称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始于元代，属于当时都察院（后改为中庆路）下的一个县，即“昆明县”。但是“昆明”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却是汉代，即在古滇王国的时代，它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部族名称，这个部族也不居住在现在的昆明地区，而是在现今的滇西大理地区一带。当时“昆明”族与居住在“滇池”地区的“滇人”相互间已经发生各种联系，有时他们之间还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物雕刻有“辫发”的“昆明”人为“椎髻”的“滇”人所俘虏的形象。至于“昆明”后来成为滇池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名称，却是长期历史发展演进的产物。

三、诸葛亮南征会滇池

东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分裂和动荡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融合的重要时期。

在东汉以后的三国时代，内地分裂为三个政权，这就是魏、汉（蜀汉）、吴三国。三国时，当时的云南地区被称为“南中”，南中地区的实际统治权掌握在一些拥有大量财富和强大武装力量的所谓“大姓”手中。这些“大姓”大多是从中原内地迁来的汉族移民，经过几代的经营发展，势力强大起来，他们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成为独霸一方的豪强势力，不服从内地政权的政令，最后进而与内地政权相抗衡。为了使自己的抗命不遵获得合法的借口，大姓们辩解道：“天无二日，土无二主。现在天下分裂为三个政权，每个政权都说只有自己才是代表天意的正统，我们这些偏远地方的人，实在弄不明白该听谁的政令。”当然，大姓们这些话只是托词，其真实目的是要据地自雄，独霸一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姓们还派人与东南的孙吴政权联系，共谋反对蜀汉。

当时建都成都的蜀汉政权正着手准备北伐中原，以谋统一中国。大姓们的反叛，直

接威胁着蜀汉政权的安危。为了巩固自己的战略后方，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进行南征，讨伐反叛的“大姓”和地方民族势力。

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叛。蜀汉军队先是会集于今天四川的宜宾，然后兵分三路。一路由马忠率领进攻仿于现在贵州西部地区以朱褒为首的反叛势力，一路由李恢率领进攻滇池地区以大姓雍闿为首的叛军，而诸葛亮自己则亲率一支大军，由今天的宜宾地区向西昌地区进攻，讨伐叛军高定元部。在西昌与叛军展开激战，利用叛军内部的矛盾杀死了高定元。然后诸大军渡过金沙江，由现今的楚雄地区进入滇池地区。而在滇池地区，李恢也用计击败了大姓和部族势力。加上马忠的军队，诸葛亮三军会师于滇池地区，南征取得全面的胜利。

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既用武力给予沉重打击，同时又注意政治争取，从而换得叛军的降服。为此，以三国历史为题材创作的著名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描绘了一个“七擒孟获”的著名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诸葛亮用和战两手策略收服了叛军首领孟获，从而取得南征的胜利。当时孟获几次为诸葛亮所擒获，但孟获仍然表示不服输，为了使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几次将其释放，让其领兵再战，直到第七次被俘，孟获才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蜀国，不再反叛。从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看，三国史上确有孟获其人，但“七擒孟获”的事件史无记载，因此，“七擒孟获”的故事既不可信，也不大可能，应属于文学家的创作和演义。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废除了益州郡这一行政建制名称，在南中地区设立建宁郡，建宁郡的郡治也从原益州郡的郡治滇池县（今晋宁县）迁到了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后来又把原益州郡和永昌郡（郡治在现今保山）所统辖的整个南中地区（包括现今的云南全部地区）进行调整，划分为七个郡，即史称的“南中七郡”，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南中地区的控制和统治。

四、爨氏称霸南中

三国纷争结束后，晋王朝统一了中国。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在南中地区设立宁州。宁州是晋王朝全国所设的十九州之一，自此云南成为直属中央政权管辖的一个大行政区。宁州的统辖范围包括了整个南中地区。虽然晋朝暂时统一了全国，然而当时全国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消除。晋王朝覆灭后，全国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南方政权和北方政权之间长期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宁州地区属于南朝政权所统治。然而这种统治大多数时候仅仅是名义上的，宁州的实际统治权掌握在以爨（音cuàn）氏为首的“南中大姓”手中。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大姓的势力不仅没有被彻底消灭，出于对当时实际情况的考虑，诸葛亮对大姓还给予了一些特殊的扶持，使得大姓势力很快又进一步发展起来。当时南中地区的“大姓”很多，但最有势力的是他们当中的“四姓”，即“四大家族”，而“四姓”中又以爨氏最为显赫，不可一世。实际上，当时宁州政权长期为爨氏一家所把持。根据后世出土的《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的记载，爨氏家族的人物长期担任宁州刺史，即南中地区的最高长官。这种职位在形式上既可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也可能是自封和世袭的。由于当时的分裂和战乱，无论是南方朝廷还是北方政权，对南



中地区的统治经常都是名存实亡的，对于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莫可奈何，为此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爨氏家庭独霸云南地区，成为一个尾大不掉的地方政权。

在爨氏统治时期，与内地长期不断的纷争相比，云南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社会经济文化较之以前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地区上来说，当时宁州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滇东和滇中地区，虽然爨氏的统治中心在建宁郡（即今曲靖地区），但在建宁郡管辖的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整个宁州地区都是较高的。这里人口众多，牛马遍野，还出产黄金、珠宝等珍贵物品。

五、最早的昆明城——南诏拓东城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究竟是何时正式建城的呢？这个问题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前已说过，汉代时，在今昆明市区划范围内设置过谷昌县。谷昌“县城”的遗址和遗迹人们一直没有发现。从汉代时的情况来看，所谓的谷昌“县城”应该只是一个很小的官府所在地，随着历史的变迁，自然早已淹没不见。因此，汉时的谷昌县城从正规的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最早的昆明城。

最早的昆明城应是唐代时南诏所建的拓东城（南诏后期更名为都闾城）。拓东城的建城背景还得从南诏的兴起和建国说起。

在经过了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和战乱后，公元581年，隋朝统一了中国。隋朝廷很快就派大将来岁率军南征，降服了爨氏，并改晋宁郡为昆川。不久，隋朝为唐朝所取代。唐朝初年，在云南地区设立南宁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治所在味县（即今曲靖市）并把南宁州划分为92州，在滇池地区设立昆州，管辖原昆川地区。实际上当时云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以爨氏为首的大姓手中。昆州刺史即由爨氏家族的爨弘达担任。

唐朝中期，居住在滇西洱海地区的被称为“乌蛮”的各部族力量逐渐强大起来。这些部族中共有六个较大的部落，称为“六诏”。“六诏”中以居于南部的蒙舍诏力量最强，称为“南诏”。在“六诏”兴起的时候，居于中国现今西藏地区的吐蕃也正处于力量强大的鼎盛时期，吐蕃四处扩张，并把势力伸入到洱海地区。为了对付吐蕃，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南诏国，并把吐蕃势力从洱海地区驱逐出去。公元738年，唐朝封南诏王皮罗阁为云南王。

南诏建国后，积极向东扩张，不仅消灭了爨氏势力，而且把原在滇池地区存在的唐王朝力量也驱逐出去，从而把现今云南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纳入南诏的统治之下。公元764年，南诏王阁罗凤（皮罗阁之子）东巡至滇池区域，看到此地山川险要、物产丰富，觉得此地“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可攻可守，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于是命其长子凤伽异率领“昆州城使”杨牟利在滇池畔筑拓东城，用来镇守南诏国的东部辖境。拓东，意思就是向东开疆拓土。阁罗凤并任命凤伽异为“二诏”（副国王），驻守在拓东城。

南诏在修筑拓东城的同时，为了巩固统治和发展经济文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南诏国王下令将居住在滇池地区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西爨白蛮”迁移到滇西

的永昌地区（今保山地区），而把滇东地区的“东爨乌蛮”和滇西北地区的其他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部族迁移到滇池地区，使拓东城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南诏建立拓东城，在昆明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然而，南诏所建的拓东城其位置究竟在现今昆明地区的什么地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近年来，随着昆明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考古工作者对许多城市建设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工作者在金碧广场东侧的富邦地基下发掘出大量南诏时的器物，有“水井群”、“开元通宝”钱币，“灰陶器”、“铁器”（包括铁秤砣、铁杯）、“唐砖”、“唐瓦”、“水桶”等。这些器物的出土说明，南诏时这一带是人口稠密的居民聚居区。

伴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一个历史之谜也被揭开：南诏所筑的拓东城就在今天昆明的城区里。它的位置为东至现在的同仁街，南至土桥，西至鸡鸣桥，北至东风西路。

拓东城的建立有力地巩固了南诏的东方地区，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拓东城“威摄步头（今建水），恩收曲靖（今滇池和滇东北地区）”，成为大理国管辖其东部地区的据点和堡垒。并且南诏国王和其他王公贵族也经常巡游拓东城，使拓东城不仅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南诏国的“东都”和“上京”。

今天当人们看到昆明城南书林街和东寺街上遥遥相望、东西对峙的两座古塔——东寺塔和西寺塔时，还能领略出南诏时拓东城的文化风貌和文明发展成就。东寺塔和西寺塔皆是南诏时的拓东城遗物，建于南诏王劝丰佑统治时期（公元824—859年），由南诏国乔柝节度使王嵯巂聘请唐朝著名工匠尉迟恭韬主持建造。两塔在结构上都是13层的密檐式方形空心砖塔，东塔高41米，西塔高36米。东寺塔顶的四角各有1只贴以金箔的金鸡，鸡喙内装有铜质的舌簧管笛，每当刮起大风时，管笛就会鸣响，因此东寺塔也称为金鸡塔。东寺塔在1833年因地震而倒塌，现在所看到的东寺塔为1877年在原塔以东数百步的地方仿西寺塔的形制重新建造的，而西寺塔却历经千年而无大的损坏，成为昆明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

六、大理国的“东都”——郡阐府城

公元937年，南诏国为大理国所取代。大理国的建立者为段思平。大理国的都城在羊苴咩城（今大理古城），它的管辖地区也基本上为原南诏国的统治范围。所不同的是，在大理国立国的300多年中，大理国与内地汉族中央政权之间交往联系较少，对外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大理国内部社会也比较定安，在这种情况下，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大理国的行政区划为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大理国在滇池地区设立郡阐府，由朝廷里掌握实权的大臣高智升管辖，郡阐府驻地也由拓东城改名为郡阐城，作为大理国的“东都”。高氏家族对郡阐城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修房建塔，使郡阐城在南诏拓东城的基础上规模更大，景色更美，成为大理国名副其实的“东都”。

大理国的达官贵族们对“东都”郡阐城的秀丽景色十分喜爱，许多人在郡阐城修建了舒适的豪宅大院，长期居住于此。不仅如此，喜爱风花雪月的贵族官僚和文人雅士们还在郡阐城周围种花植树，把郡阐城装点得花团锦簇，秀丽迷人。他们在城市东边的

盘龙江岸筑“云津堤”，在堤上广种白色的素馨花，花开时节，满堤雪白，人们因此就把云津堤称为“银梭”或“银堤”。而到花落时节，雪白的花瓣飘浮于河中和岸上，使河水显得银光荡漾，因此人们也把盘龙江称为“银汁河”，在城市西边的河岸下，则修筑了“春登堤”，在堤上种植迎春柳，每当春暖花开的时节，堤上一片金黄，所以人们就把这条大堤称为“金堤”或“金梭”。把落花时节金光激滟的河流称为“金汁河”。直到今天，当人们谈论起“绕道金梭河”和“紫城银梭河”时，对大理国时昆明的美景仍然心醉神迷，充满向往。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近千年历史风云的急剧变幻，对于大理国都阐城的规模和格局，人们今天已不可能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但从大理国所留下的石幢中，我们还可略见都阐城文化和风尚之余韵。

大理国石质经幢位于拓东路古幢公园内（即今昆明市博物馆内）。是大理国时议事布燮袁豆光（议事布燮为大理国时职权相当于宰相的高级官员）为了歌颂都阐侯高明生的功德而建的宗教性建筑。这座石幢高 6.65 米，呈方锥形状，共有 7 层、8 面。幢基为圆鼓形，上面刻有 8 条龙，每两条龙为一组，形成“二龙抢宝”之态。幢身第 1 层刻汉文《大理国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及梵文（古印度文字）《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佛经。第 2 层刻佛教中的四大天王像。四大天王面朝四方，头戴王冠，身穿甲冑，手持斧钺宝剑，脚踏夜叉，神态威武。第 3 层至第 7 层雕刻有各种佛像、菩萨、神鸟等，幢顶是一个由莲花瓣承起的圆球。整个经幢共雕神像和佛像 200 多尊，这些雕像大的有 1 米多高，小的仅有 5.6 厘米高。这座石经幢不仅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在造型上，整座石幢布局严密，层次分明，在雕像的塑造上，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身体各个部分比例协调。在雕刻上，线条鲜明流畅，刀法苍劲有力。整座石幢的雕刻既宏伟壮观，又精巧细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故此，人们对大理国时期的这座石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对石幢发出了这样的赞叹：“滇中艺术，此极品也。”现在这座著名石幢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政府的重视下，石幢所在地建设成为昆明市博物馆，这座艺术珍品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七、赛典赤治滇和元代的中庆路

在大理国后期，也即中国南宋朝的末期，兴起于中国北方大漠高原地区的蒙古族在迅速扫荡了中国北方、西北及中亚地区之后，发起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大规模征战。出于战略上的宏观考虑，蒙古军队决定先占领云南地区，然后从北方、西南方向对南宋王朝进行战略包围和攻击。

公元 1253 年，蒙古大军在忽必烈的统率下，强渡金沙江，从西北方向对云南发起攻击，很快便攻占了大理城，大理国由此灭亡。第二年，蒙古铁骑在大将兀良合台的率领下，攻占了都阐城。从此，整个云南地区都为蒙古军队所占领和统治。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在《大观楼长联》中被形象生动地称之为“元跨革囊”，即蒙古大军以吹饱了气的牛羊皮口袋为渡江工具，强渡金沙江，攻占云南。

“元跨革囊”是云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蒙古人所建

立的元朝在云南地区建立云南行省，由中央政权直接进行控制。在行省之下，逐级设立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进行有效的管辖。自此以后，云南地区与中央政权和内地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进一步加强。

云南行省的首任行政长官即平章政事为回回人赛典赤。赛典赤的全名为赛典赤·赡思丁。“赛典赤”是波斯语，意思是“贵族”，赡思丁是他的名字，出于对他的尊敬，人们习惯上只称其为“赛典赤”。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在成吉思汗大军西征时，他率部归顺了蒙古，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重用。赛典赤极富政治才能，十分精明能干，屡建功勋。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赛典赤为“平章政事云南行省”，派他到云南来建立行省政权，希望他能够以“谨厚”的方针安抚云南地方，消除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

赛典赤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推行教化，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措施包括：把行省的政治中心由滇西的大理迁到滇中的中庆府（即原都阐府），从而摆脱守旧势力对行省政权的影响和干预；设立劝农官，奖励种田养蚕，对于贫困无助的农民，则由政府贷给种子、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兴修水利事业，先后修建了松花坝、疏浚了滇池出海口，做到了防洪灌溉并举，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修建孔庙，提倡儒学，创立庙学（当时的学校），并拨给学田作为办学的经费来源，促进了内地先进的汉文化在云南边疆地区的传播，为在云南推行科举制度打下了基础。

公元1279年，赛典赤病死于云南平章政事的任内。由于他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利益，因而他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戴。他死的时候，中庆路地区的各族百姓聚集于大街小巷，痛哭不止。朝廷追封他为咸阳王，并把他葬在现今北郊马耳山麓的松花坝水库前，而在昆明城东五里多（蒙古语“兀尔朵”的转写，意为“帐殿”）则为他修建了一座衣冠冢。至今人们对赛典赤还充满怀念。

元代昆明地区的情况如何呢？元代对云南历史发展是一个转折，对昆明的历史发展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元初，曾把都阐府改为万户府，随之，原都阐府驻地都阐城也被改名为昆明千户。这是“昆明”这个名称第一次作为地名出现于历史。有学者认为，元朝统治者很可能是将唐代作为地名的“昆川”与作为族称的“昆明”混为一谈，才把都阐城命名为“昆明”千户的。时过不久，在云南行省建立后，都阐府（万户府）被改为中庆路。中庆路下设嵩明、晋宁、昆阳、安宁4个州和昆明、富民、宜良3个县，管辖范围包括了今天昆明市的主要行政区域以及楚雄州和玉溪市的一部分。随之，昆明千户也更名为昆明县。作为中庆路的首府，昆明城也被称为中庆城。在设立中庆路的同时，赛典赤把行省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到中庆路，从此，昆明这座滇池之滨的秀丽古城正式成为云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直至今日。

元代昆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在赛典赤的规划和率领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当时滇池经常泛滥成灾，经过调查，赛典赤发现这是由于流入滇池的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等长期失修以及滇池出海口阻塞不畅造成的，因此他组织民工对滇池周围水系进行疏浚。通过对滇池地区河流和海口的疏浚，不仅使昆明城和周围的农田

不再遭受滇池的水患，而且随着水位的下降，还增加了大批良田。同时，赛典赤还在盘龙江上游修筑松华坝，目的在于拦洪蓄水。松华坝的修建和加固，既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又保障了昆明地区的农田灌溉，使昆明城市的发展从此有了基本的水资源保证。直到今天，当年兴修的这些水利工程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造福昆明人民。

随着政治地位的增强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元代的昆明城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工商业发达的繁华都市。当时的中庆城是座南北长而东西短的土城，南端在今土桥，北端在五华山，东南靠近盘龙江，西边在今沿福照街西面到鸡鸣桥一线。市中心是三市街，而交通要道则是从三市街东经白塔塔洞，东出金马关的通京大道。元代的昆明城与滇池相连，城市周围万帆云集，各种船舶穿梭往来，运送货物和客商，全省各地的奇珍异货，尽皆汇集于昆明。这就是诗人笔下所说的：“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船蜂屯于城根；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公元1284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昆明。在他著名的游记中对昆明作了这样的描写：“达到省会，名雅歧，系一壮丽的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为杂居之地，有偶像崇拜者，聂斯托利派基督徒，萨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数最多。本地生产的米麦甚丰，然人民认小麦制的面包为不卫生，故不用面包而用米食。并用其他从谷类加入香料，制成酒，清澈可口。至于货币是以海中所取的白贝壳充用，兼可作为头饰，……这里有许多盐井，居民所用的盐取给于此。”

正如五百里滇池始终翻滚着不息的波涛一样，元代的昆明在表面的繁华与宁静背后，也涌动着政治上的险风恶浪。在元代末期，昆明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哀婉凄绝的政治和爱情悲剧：孔雀胆的故事。

“孔雀胆的故事”说的是：元朝末年，原大理国王室后裔的段光作为元王朝敕封的大理总管控制着滇西地区，与居住在省城昆明、代表蒙古王室统治云南的梁王处于长期的对峙和激烈的权力争斗之中。而在此时，席卷整个中国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狂潮也已逼近云南。公元1362年，红巾军进攻云南，梁王败逃到今天的楚雄一带，向大理求救。此时，段光已死，其弟段功继任大理总管。段功发兵救援，大败红巾军。由于段功救驾有功，梁王上报朝廷，授予他“云南行省平章”之职。同时，梁王将女儿阿盖公主嫁给段功。受到梁王重用的段功忘了段家和梁王之间的长期仇怨，一心要追随元朝建功立业，留在昆明不想返回大理。他的嫡妻高夫人和部将均敦促他返回大理，不要再为梁王所利用。为了劝说段功，高夫人从大理写词一首寄与段功。其词云：“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寂寞倚屏韩，春雁纷纷促。蜀锦半床闲，鸳鸯独自宿。珊瑚枕冷，泪滴针穿目！好难禁，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影与身独。盼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诉说对段功的无尽思念和深情。无奈，段功只好返回大理。然而不久之后，段功不顾大家的劝阻，执意又来到昆明。

此时，红巾军已经退走，梁王已不再需要段功，段功的到来，引起梁王的猜忌和不安，觉得段功此来，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是为了与自己争夺云南的天下，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梁王决定除掉段功。梁王把奇毒无比的孔雀胆交给阿盖，要阿盖毒杀段功。梁王对阿盖说：“最亲的人是自己的父母，最珍贵的是江山社稷。段功显然要抢夺我的天下，因此必须把他杀掉。只要保住了江山富贵，其他一切都是手中之物。现在把

孔雀胆交给你，你找准机会把他毒死。”情深意重的阿盖不从父命，并暗中将父亲的计划告诉了段功，并出示了梁王给她的孔雀胆，说：“我父亲对你怀有忌恨，不如我们一起到大理去。”可段功自恃有功于梁王，不相信梁王会杀他，对此事不以为意。不久之后，梁王利用到东寺讲经之机，在半路上令部将将段功杀害。阿盖闻讯，伤心欲绝，肝肠寸断，在写下了一首哀婉动人的绝笔情诗之后，绝食殉情而死，其诗曰：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
 黄蒿历乱苍山秋，误我一生踏里彩（踏里彩为蒙古语，意为锦被）。吐哩吐哩
 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濤不见人，押不鲁花（押鲁不花为蒙古语，
 意为起死灵草）颜色改。肉屏（蒙古语，意即骆驼）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
 （铁立意即松林）风潇洒。

段功一死，大理与梁王的关系彻底破裂。到红巾军二次进攻云南以及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军长驱直入云南时，梁王再求救于段功之子段宝，段宝坚决拒绝，并归顺了明朝。梁王陷于孤立，自杀身死。

几百年来，“孔雀胆”的故事在昆明和云南地区相传不绝。“孔雀胆”的故事也使中外艺术家们相染青衫、唏嘘不已。现代文史大师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为“孔雀胆”的故事所打动，以这一历史题材为线索，创作了著名史剧《孔雀胆》，使“孔雀胆”的故事流传于全国。《孔雀胆》向人们展示了一幕政治与爱情相互交织、残酷无情的政治私欲毒杀美丽爱情的历史悲剧，把元末乱世风云下云南地区的家仇国恨和儿女情长惊心动魄地展现出来，深深地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

八、明代的云南府城

公元1381年，刚刚在农民起义的大潮中夺得天下、登上大明王朝皇帝宝座的朱元璋，派遣30万大军，在大将傅友德及蓝玉、沐英的统率下，进兵云南。明军与云南梁王的元军在曲靖白石江展开激战，明军大败元军，直入昆明，元朝在云南的统治被彻底推翻。

明朝在击败元朝势力，占领云南地区后，把云南行省改为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命沐英留下镇守云南。在布政使司之下，设立府、州、县，中庆路被改为云南府。云南府下辖4州9县，即晋宁、安宁、昆阳、嵩明4个州（每州辖两县）和昆明、富民、宜良、罗茨、易门5个直属县。昆明县是云南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和云南府的所在地。

明军虽然以不可抗拒之势，长驱入滇。然而，明朝初年，滇云的局势仍未可乐观。从人口上来说，当时的滇中地区仍是“人民半杂夷”，即夷多汉少。由于文化、习俗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夷汉之间的隔阂、冲突时有发生。此外，由于明初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发生了著名的“靖难之役”，建文皇帝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后，传说来到了云南，这更使明朝中央对云南放心不下。再加上边境不宁，一些民族上层不断发动叛乱，更使得滇云局势扑朔迷离。为了巩固政权，明朝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这就是移民实边和驻军。

从移民情况看，明朝政府有组织地迁移了大量内地居民到云南。当时迁移来滇的汉